

想起朱光潜先生

钱理群

近来读到张曼菱的《北大回忆》，书中一个细节让我有感而发：

这是张曼菱与朱光潜先生的一次校园奇遇：八十年代初如饥似渴的张曼菱，在未名湖畔捧读前辈朱光潜的著作，这位“晨气中过来”的老者，却“不以为然地”摇头说：“这本书里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，你最好直接看英文原本。”当得知这就是朱光潜本人时，张曼菱不禁大叫：“唯我北大朱先生也！”我读到这里，也是震惊不已。以后的数日内，脑海里一直回旋着朱先生的这句话。仔细想来，我的震惊有三：

第一，朱先生说的是老实话，道出了那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。这些年人们很喜欢自封或到处封“大师”；但我一直认为，现代中国无大师，原因就是朱先生所说的，即使是成就最高的学者也“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”，而“原创性”正是成为大师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条件。《北大回忆》提到的朱光潜那一代前辈，就其学养和精神境界而言，完全有可能出大师，但他们生不逢时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小试锋芒以后，就遇到了战乱，接着又是连续三十年的“思想改造”，到八十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，但岁月不饶人，且元气大伤，已经无力构建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了。这真是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。

第二，毕竟这代人还保持着清醒，而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，朱光潜先生的自省让人感佩之处，不仅在于其自知之明，更表明他

心中自有—个“学术高峰”的标准。但今天，再也没有、也不会出现“朱光潜”了。你看看那些感觉始终良好、不断吹嘘自己、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“学者”，在那里霸占着中国的学术界和讲台，真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曾经批评北大在培养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听说在网上传得很广；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：今天的北大教师里，恐怕也有不少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当然，这只是一部分人。因此，更应让我们担忧的是普遍的学术与精神状态。作为朱光潜先生那一代人的学生，我曾经反省自己知识结构、精神结构的缺陷，自嘲说我们是一代“没有文化的学者，没有情趣的文人”。而据我对学生辈的观察，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合理，在具体的专业研究领域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，但总体来说，他们似乎都存在一个在学术与精神上“精细有余，大气不足”的缺陷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北大学子，漫步未名湖时，已经再也不能像当年的作者那样，奇遇“朱光潜”了。许多人都在谈论今日之北大的衰落以致堕落，体制的弊端当然是主要的原因，但不可忽视的，是教师队伍素养的总体下降。这又和体制问题相关，体制与队伍问题的交织，恐怕是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。

第三，还是顺便谈谈北大的学生问题。今天的未名湖畔，不仅没有“朱光潜”，也没有“张曼菱”。前面说到，张曼菱当年是把北大当作“精神的圣地”的，而今天相当多的北大学生是把北大当作日后成为“人上人”的阶梯。《北大回忆》里深情描述过的北大西门“小金水桥”，如今已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称为“状元桥”。“朝进北大门，暮登天子堂”已经是今日许多学子的“北大梦”，这和我们当年的梦想大不一样了。

朱光潜当年要学生丢掉自己，作者说，这是甘当“铺路石”，期待后人超越自己。这一理解是对的：张曼菱的书里，生动地记录了那么多的前辈对她特别的关爱，这是对八十年代入学的一代人的关

爱。老先生们都期待，这一代人能够冲破藩篱，创造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真正辉煌。在他们中间，会出现文学大师、学术大师、思想大师。张曼菱们恐怕也是这样自许的，他们当年表现出来的才华、精神气质，也让人觉得大有希望。今天已是三十年后，我们可以作一个历史的总结。那么，在充分肯定这一代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、获得的杰出成就的同时，也必须正视一个现实：他们依然像当年朱光潜自我反省的那样，“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”，依然没有出现大师，依然是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——这正是我最感震惊之处。

那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朱光潜们是因为战乱，因为“思想改造”；张曼菱们的悲剧原因何在呢？这难道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吗？

就把这些问题留下，以后不断思考与讨论吧。

（《北大回忆》，张曼菱著，生活书店二〇一四年版）

短长书

林毓生的真性情

萧功秦

余英时、林毓生都是台湾学者中的大师级的人物，回忆一下三十年来我所认识的林毓生，是件很有趣的事。

我可以算是认识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国青年学人之一。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时，作为陪住在留学生宿舍一住就两年多，在留学生楼，我认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林琪（Lynch）小姐，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，她向我介绍起不久后将前